

理论阵线

《新世界史纲要》到底「新」在哪里？



钱穆

书,周一良和吴于廑主持编写的新中国第一部4卷本《世界通史》便是以苏联这本书为摹本的。

但是,无论是西方的还是苏联的世界史研究体系,都有其自身的缺陷与不足。首先,“西方中心论”的观点深刻影响着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黑格尔是“西方中心论”的始作俑者,钱穆且用十分通俗的话解释了黑格尔的说法:在黑格尔看来,文明经历从不成熟到成熟、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不断发展中,它像太阳一样,从东方升起,并不断地向西方移动,最终落到了欧洲的普鲁士(即黑格尔生活的地方),形成了精神上的万丈光芒,成为文明的最高表现。黑格尔的这套说法后来被西方学者继承下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这个思路,只不过文明最辉煌的地方变成了美国,而不是普鲁士。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人们以为只有西方的历史才是“世界史”,“西方”变成了全世界。而在西方国家中,英、美、法、德等尤其受到关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民族被排除在外。

苏联史学则存在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阶段,最终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但苏联史学把这个理论绝对化了,认为世界所有国家都走同样的路,都会依次经历每一个阶段。中国史学界曾经对这种观念进行过讨论,试图弄清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是否符合这个说法,但这个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苏联史学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做了教条主义和机械论的解释。

以“马”为引,双线并进

随着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日趋完善,摆脱西方中心论与苏联史学缺陷影响,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理论体系的呼声也鞭策和激励着几代世界史学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世界史纲要》应运而生:它以坚实的学术传统为基,以先进的科学理论为引,该系统性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强世功教授在《新世界史纲要》新书发布会现场提出,对于历史的书写始终面临着一个理论的框架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也是指导《新世界史纲要》写作的重要依据。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基本原理,尤其是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形成的理论的深刻理解和,《新世界史纲要》采用了纵横两条线索作为编写的总体逻辑:世界历史既是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演进过程(纵线),也是从分散到整体的融合的过程(横线),这两条线交叉融合、同行共进,最终形成总体历史的立体网络。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形成的。在苏联的教科书中,对各国和地区的叙述往往采用“叠加”的方式,也就是各自进行单独叙述,未能形成整体框架。与此不同的是,《新世界史纲要》从纵横两条线构成的立体空间看待整体的世界史,一方面是社会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文明的沟通交流,由此还原历史本来具有的复杂过程,显得气派恢宏。

以15世纪开始发展的大航海为例,在以往的著作中主要聚焦的是西欧等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贸易体系以及殖民体系的形成,视角较为单一。但是《新世界史纲要》从第四章开篇就对近代早期的世界做出了提纲挈领的总结:“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是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过渡;从历史的横向发展看,是各文明圈之间突破了相对闭塞、隔绝的状态,从分散走向整体,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加强。”不同文明间多元格局长

期维持的局面得到了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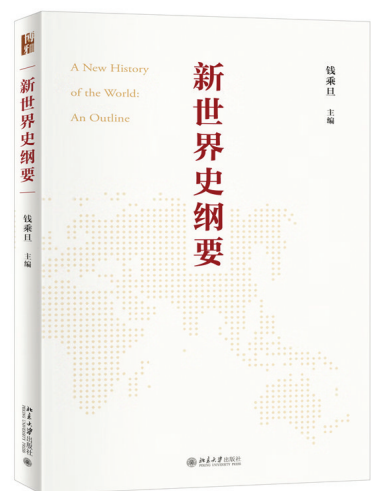
同时,基于中国世界史学家的思考所得出的论断,《新世界史纲要》在内容编排中也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在对世界文明产生的叙述中,不同于以往书写传统,《新世界史纲要》也将黄河、长江流域置于前列,吸收了考古与中国史学人研究的新成果。对于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问题,该书也做了思考与回应。由于各种原因,在以往的世界史著作中,中国史往往不包含在内,仿佛中国不属于“世界”。但是在该书中,中国史在世界史框架中有了明确的位置,世界历史发展图景也因此更加完整而科学。

除了学术研究,《新世界史纲要》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历史教学也起着重要作用,对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世界能够起到正确的导向;它层次丰富,包含着对政治、经济、文化和哲学等方面的整体理解;它线索清晰,有对过去的熟悉,也有对当下的理解,更有对未来的预见与期盼;它融合贯通,能够以世界史的写作来带动人文社科整体领域的碰撞与对话。

世界舞台,中国之声

从立项、筹备到出版,《新世界史纲要》都一直坚持牢记使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首先,《新世界史纲要》有利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世界发展的纵横并进,从理论上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的科学性,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与交流互鉴。

同时,《新世界史纲要》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了学术力量。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相较于经济繁荣、军事进步和科技创新等国家硬实力的腾飞,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等软实力在国际舞台中的影响力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和发展潜力。“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世界史纲要》充分挖掘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资源,坚实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坚持原创性、时代性,又把握系统性、专业性,体现了



由钱穆主编的《新世界史纲要》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色、风格和气派,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在新时代注入生命力,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的扩大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提供支撑。

摆脱西方中心论与苏联史学缺陷的影响,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是中国几代世界史学人的夙愿和夙愿;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是中华民族儿女的希冀和使命。时代的车轮前进到今天,历史的接力棒稳稳地交到了新一代世界史学家的手中。《新世界史纲要》的问世正如“石破天惊”,必将在学术界与社会各界激起浪潮,为中国特色世界史学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扬起风帆。

俞光岩：无德不为医，为医必厚道

【编者按】由北大医学部推出的观察型纪录片《医者厚道》记录了北医人在面对不同患者、不同病情的行医故事。近日,校报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中的几位优秀医者,挖掘镜头外的细节,来展现他们勇于担当、医者仁心的厚道品格以及传承不辍的厚道师德。本期为读者呈现的是对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任医师俞光岩教授的专访。

校报记者 王挥闵

初秋的傍晚送来朦胧柔和的风,为正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离开的病患和家属们掸去几分忧虑和疲惫。窗外人声喧闹,窗内宁静如水,此刻,口腔颌面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俞光岩正与采访记者对坐,神情自若、言谈亲切。在他潺潺如水的叙述中,可见潺潺波光与徐徐树影,那便是他用躬行实践对医者厚道的阐释。

蔼然可亲,心系患者医德

说起对厚道行医的理解,俞光岩首先提到的就是要有热情的服务态度。他还记得,曾有学生开玩笑说:“病人不听话,得治一治。”当时他摆摆手正色道:“要想提高病人的依从性,不能靠‘治’,而是要靠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

医疗服务是一种艺术,他如数家珍:要跟病人做朋友,让病人感到亲近和信任;要倾听病人的诉说,关注和了解病人的心理状态,从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要与病人平等交流,有效沟通,尤其要注重术前谈话。在术前谈话中,需要阐明手术的必要性、风险及应对措施,既要让患者考虑全面,做足思想准备,又得避免因沟通方式不当而刺激、吓退患者。

谈到这里,俞光岩想起了几十年前的一件看似平凡的小事。当晚值班时,一位年轻医师告诉他,一位患有早期口腔癌的病人不太配合第二天的手术安排。他于是找到这位病人,将早期癌预后相对乐观、治疗经验丰富的情况与他娓娓道来,言语中既有医生的冷静又不乏朋友般的关怀。病人因此选择了接受手术,积极治疗,最终恢复了健康。从此,这位病人心怀感恩,常常利用他从事电影公司技术员的职业技能,来为忙碌于病房内外的医护人员修理冰箱、录音机这些电器,与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许多年后,病人又一次与俞光岩谈起当年的事。他的眼中炯炯生辉:“俞大夫,手术前那晚的谈话,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我都印象深刻。那一番话,救了我一条命。”他坦陈,当年看到病历上写的是“癌”,霎时间心灰意冷的。他担心癌症无法根除,治疗开销还会拖累新婚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已经做了自我了断的打算。是俞光岩的术前谈话改变了他的命运。现在,这位病人已经成为了电影公司的技术骨干,由他担任制片人的电影已经上映,他向俞光岩报喜。“病人朋友取得了成就,比我自己获个科技奖还要高兴。”俞光岩语音未落便笑逐颜开。

俞光岩在几十年的医者生涯中诊治的肿瘤病人还有很多。很多恶性肿瘤患者在康复后,时隔十五年、二十年,又来到他这里复查,他们满心感激地握着他的手道谢,与他合影留念。俞光岩形容,那时的感受是任何物质都不能替代的。从前还有一位口腔多发癌的患者,因为肿瘤反复发生,前后后做了多次手术。此后他每年春节都会到俞光岩等几位医生家中拜访探望。他去世后,他的女儿和女婿受他嘱托,将这一习惯与新春灯火一起延续着。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情谊,就这样随血缘传递到了下一代。

在沿途盛放的回忆里,俞光岩倾身摘下这样的感触:“为病人挽救生命、解除痛苦、带来欢乐,是医生幸福感和成就感的来源。”

治学不辍,苦心钻研精医术

没有止步于口腔颌面部肿瘤领域,俞光岩更多是凭借血管化自体下颌腺移植治疗重度干眼症而为人们所熟知。干涩、刺痛、异物感,重度干眼症患者眼部往往感到强烈不适。日积月累,他们的视力也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致盲。俞光岩曾接诊过一个年仅九岁的小姑娘。三年前,重症药物过敏反应不幸发生在她身上,引发了史蒂芬-强森综合征,严重损害了她的眼角结膜、口腔黏膜乃至全身皮肤。自此累及泪腺,出现双侧的重度干眼症状。小姑娘明亮的眼睛逐渐被茫然浸染,她的视力一降再降,最后仅能识别眼前手动。吃饭时她四处摸索都找不到筷子,走路时也需要母亲寸步不离地搀扶,生活已经不能自理。

但是,医疗技术改变了这惨淡的现实。将能够分泌泪液的自体下颌腺移植到眼眶,导管转移到眼眶,用移植下颌腺的分泌物替代泪液,就能让眼睛重新润起来。经过单眼手术之后,小姑娘又能独立行走了;半年以后另一只眼也接受了移植。出院以后,小姑娘就骑着自行车上学



俞光岩

去了。俞光岩欣慰地感叹,有效的新技术,真的能够扭转患者的生活、改写家庭的未来。这样的愿望支持着他治疗重症眼干的征途上笃行不倦,至今团队已完成230多例患眼的手术,在数量上居世界之首。回顾来时路,俞光岩微笑着,过往的光彩还历历在目。1997年,他的学生,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副院长蔡志刚教授从德国带回信息,那里研究唾液腺移植治疗重度干眼症的专家很多已经把目光从腮腺转向了下颌腺。唾液腺外科正是俞光岩的研究专长。于是他成立课题组,决定将这一项目开展起来。首先选用家属进行动物实验,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接着对唾液和泪液进行成分分析,发现唾液包含着泪液中的所有成分。腮腺是浆液性腺体,而下颌腺和泪腺同属混合型腺体,果真是下颌腺的分泌物更接近泪液。就这样,1999年这一技术被正式应用于临床,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但这还远远不够。与治疗相关的问题在临床实践中接连显现,俞光岩继而率领团队与他的爱人吴立玲所在的基础医学院病理生理教研室展开深度合作,夫妻二人通力协作,从临床与基础相结合的层面进一步研究了唾液腺的分泌机制。由于腺体移植后血管吻合而神经离断,失神经支配的状态下分泌机制有所变化,具体体现在,术后三天会出现暂时性的泪溢期,而此后三个月将进入休眠期,直到第四个月才能趋于稳定。休眠期移植腺体分泌量很好,在移植远期有可能发生泪溢。另外,移植腺体缺乏自然调节机制,所以天气热时或运动过后,泪液分泌都会增加。如何按照需求人工调控移植腺体的分泌功能,成为了研究的下一个焦点。

想要小幅调节腺体分泌量,采用药物干预是优选。对于休眠期,俞光岩课题组先后发现了移植腺体表面涂抹辣椒素霜剂和腹部皮下注射卡巴胆碱两种方式能够促进移植腺体的分泌,有效预防腺体分泌不足造成的导管阻塞。通过药物干预,导管阻塞的发生率从原先的18%下降为6%。对于移植腺体分泌过多而产生的泪溢,也可通过腺体表面涂抹阿托品霜剂和腺体局部注射A型肉毒毒素这两种方法得以缓解,其中A型肉毒毒素的作用可以维持三个月,恰好可以覆盖腺体过量分泌的炎夏夏日。

但药物干预常常在移植下颌腺持续大量分泌的异常状态下显得有些无能为力。面对移植远期出现的泪溢问题,传统的方法是进行二次手术以切除过多的腺体。要想避免二次甚至多次手术,俞光岩联想到了肝脏外科中的部分肝移植手术——将供体肝脏游离出一部分植入患者体内,或许可供参考。但唾液腺只有一套血管和导管系统,应该如何在保证腺体功能正常的条件下做到有效分割呢?答案就在显微解剖研究之中。从因口腔癌而淋巴瘤清扫过程中得到可供实验的正常下腺窝,把染料树脂灌注进这些盘根错节的管道里,红色是动脉,蓝色是静脉,白色是导管,最后用醋酸浸泡,腺体被脱去,而染料树脂形成血管导管铸型。如此,血管导管系统就清晰地显露出来了。三种颜色

的管道并行分布,如同一棵枝繁叶茂的树。这样一来便可以顺着分支,以腺叶为单位分离切除部分腺体组织,保留下来的腺体组织具有较为完整的血管导管系统,这一研究结果为部分下颌腺移植手术式提供了解剖学基础。自此对临床判断术后大概率出现重症泪溢的病人,就可以通过减量下颌腺移植术式进行预防,使针对泪溢的二次减量切除手术率由80%下降到了30%。

一系列临床与基础相结合的研究工作后,俞光岩课题组形成了重度干眼症不同时期、不同情景的治疗常规。“如果没有全面、精湛的医疗技术,不能解决患者的问题,那厚道行医就成为一句空话了。”俞光岩如是总结道。

爱岗敬业,矢志不渝秉医心

“当时觉得,口腔里面不就32颗牙齿吗,有什么可做呢?”被问及与口腔医学结缘的经过时,俞光岩忍俊不禁。“文革”期间他在上中学,毕业后就回乡当了一段时间的赤脚医生。后来他被绍兴地区卫校招收,结业后分配到绍兴地区医院口腔科工作,自此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最初他对这个分配结果并不算满意,在他的印象里,口腔医生无非就是拔牙补牙,整天跟牙打交道,这种工作堪称索然无味。

但在着手去做和继续求学之后,他最初的想法在不知不觉间被彻底推翻。1976年,他成为浙江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系的第



俞光岩为学生们上课

一届学生,1979年,他又进入北京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随着对口腔科学的认识更加深入,他逐渐发现,口腔医学疾病种类多,所涉知识面广泛,操作精细复杂,有时治疗效果立竿见影,其实大有可为。与此同时,口腔医学的专业范围正在不断扩大,治疗手段不断改进,治疗效果也不断提高。让俞光岩印象深刻的,是显微外科的发展使口腔颌面部肿瘤切除后缺损颌骨的功能性重建成为可能。原本木后歪着半张脸,吃东西也只能靠半边咀嚼的下颌牙颌病人,现在患者的面部外形与咀嚼功能可以复原到和得病前相当的水平。这就是口腔医学专业的魅力,让俞光岩不由得心驰神往。

兴趣使俞光岩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临床医生的身份,即使如今他已71岁高龄,也仍然不忘在他热爱的手术台上一次次施展他年轻时的职业抱负。除医生、教师、科研工作者的身份之外,俞光岩还曾担任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院长、中华口腔医学会会长,也曾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海淀区人大代表为行业发展建言献策。他以医生身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承担起所有应尽的社会责任,可谓不遗余力。

热情服务的品格、刻苦钻研的精神、敬业乐业的态度,这些都是俞光岩在从业的四十余年中千淘万漉所得到的医道,在日常点滴中润物无声地,随血脉流长而代代传承。“俞老师就是这么一个纯粹的,无论是做学术,还是做医生,他都有一颗热忱质朴的赤子之心。我们课题组,我们病区的每个人,以及课题组及病区的风格,都有着他这种性格的影子。”俞光岩的学生苏家增对此深有体会。“俞老师那里学到的专业知识可能会逐渐生疏淡忘,但在精神层面上获得的宝贵财富是永存的。”

采访结束后,窗外夜幕已然降临。尽管采访时长超出预期,俞光岩也没有丝毫不耐,反而和颜悦色地回答了记者在口腔医学专业的学习情况。他恳切地为记者指示方向:基础阶段的学习多联系口腔、口腔阶段的学习多拓展基础,才能学精学透。临别时,他眼含笑意地嘱咐:“好好学习!你一定会喜欢口腔医学专业的。”那些教诲如春风催绿新芽,使医者厚道的情怀遍野萌发。

校报记者 陈佳艺

2023年6月9日下午,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北京大学出版社共同举办的“探索中国世界史研究与写作的新思路”研讨会暨《新世界史纲要》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中国的世界史的研究发展境况如何?该书到底“新”在哪里?它的出版又有什么意义?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了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在与该书主编——钱穆教授的交谈中,一幅有关《新世界史纲要》的图景徐徐展开。

踽踽起步,艰辛探索

相较于拥有2000多年深厚历史的传统史学而言,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十分“年轻”。从19世纪中叶发端,新中国成立以来真正得到创立与发展到改革开放后的繁荣发展时期,仅有短短一百余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史学体系与苏联史学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发展。“中国的传统里面是缺少外国历史的”,钱穆向记者介绍道。从古至今,中华文明自成一体,其世界观是“德昭四方”的天下观,在朝贡体系的影响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一个以汉字、儒学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而中国处于文化圈的中心地位。中国对周边其他国家的了解如同水中石子扩散的涟漪一般,越远越缺乏,而西方的史学传统中却一直存在“外国”与“世界”的概念,无论是西亚、北非或者地中海地区,还是后来的欧洲,都是若干个强国同时存在,即便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内部的多源性也十分显著。

中西方的史学走向了不同的道路,直到近代以来中国“开眼看世界”,西方史学体系才真正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19世纪中叶以来,陆续有国人搜集资料,对于西方有了一些基本的介绍,如《海国图志》等等,但这与学术研究还有一定的距离。在20世纪的20年代30年代以后,中国的第一批外国史研究学者才开始出现,在国外留学的经历让他们为中国带来了系统的西方史观与治史方法。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缺乏传统土壤,研究外国历史在最初并不被认为是一项专门的学术工作,研究中国历史仍然是主流,也只有中国史的论文才能为学界所承认。因此,这一批学者也从事中国史的研究,同时形成了融贯中西的知识体系与视角。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全方位学习苏联的背景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也深受苏联的影响,苏联自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继承者,其13卷本《世界通史》更是成为权威参考